

彩色时代札记

风 章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彩色时代札记

风 章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007号

彩色时代札记

作 者：凤 章

责任编辑：陈咏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金山电气公司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

字数：220,000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（内含精装100册）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332—5/I·317

定 价：4.25元（平装） 6.75元（精装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 录

在21世纪的门槛上·····	(1)
法兮归来·····	(36)
路的呼喊·····	(52)
人的“能源”的开发者·····	(66)
起飞的大地·····	(87)
时髦眼镜传奇·····	(107)
一篇未准备写的报告·····	(123)
护林员和他的狗·····	(138)
扑向绿色的大地·····	(145)
溪涧岂能留得住·····	(162)
诗乡画境·····	(170)
渡口家庭客店·····	(175)
攀登·····	(181)
一个发明者的故事·····	(187)
傲雪梅花·····	(197)
一个与淋巴瘤搏斗的胜利者·····	(205)
书画坛上一怪杰·····	(212)
在惊涛里诞生的·····	(220)
后 记·····	(299)

在21世纪的门槛上

——兼记中国大学教授们

引 子

漠漠无垠的宇宙，一颗小小的蔚蓝色的美丽的星球在悠悠地旋转。

这便是人类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球。

本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国一位伟人讲过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有个球籍问题，搞不好，中国将被开除球籍。伟人的这个警告，伟人似乎自己也未重视（也许他并不相信），因而中国没有能由此为“球籍”问题去拼搏、奋斗，却掀起连绵不断的一浪高于一浪的“人与人斗”之大潮，以达到“其乐无穷”的境界。结果是，迎来了“史无前例”、掀天翻地的狂飙巨浪的到来，差一点把中国这条航船弄了个底朝天。

当我们这个星球悠悠地转到本世纪最后一个龙年，即当人类站立在21世纪门槛上之际，又有人提出中国的“球籍”问题。此次提问题者，不是伟人（伟人早已故世），而是一些记者、编辑，还有一些教授、研究员、专家学者，即一批知识分子。他们列举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中足以使我们这些“龙的传

人”触目惊心的数字，如：

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排位，总是徘徊于倒数20多位，与世界上最落后的非洲穷国索马里、坦桑尼亚相近；若与先进国家比，仅是日本的1/30，美国的1/35，瑞士的1/40；而这个水平，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达到。

1955年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（GNP）占世界的额份是4.7%，而1980年下降到2.5%；

1960年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（GNP）与日本相当，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/4，到1985年下降到1/5；

1960年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，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了36800亿美元。

他们出发聋振聩的惊呼：

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！

世界已向我们亮出“黄牌”！

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“球籍”问题！

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！

“球籍”！“球籍”！1988，中国知识分子关于“球籍”问题的忧思年！

然而，当以龙为标志的1988年带着一身疲惫悄然离去时，我打开笔记本，翻阅不久前我到几个大学中采访的札记。我忽然发现，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多么微弱！尽管他们是在加大音量呐喊！惊呼！呼吁！嗓子爆破，喉咙生烟，却总盖不过丰田、皇冠、奔驰卧车的嘀嘀声，美酒佳肴公费宴上碰杯的叮当声，豪华大厦里自动空调的微微呼吸声……

“球籍”问题确实令人心忧，但更令人心忧和可怕的是浓雾一般弥漫的那种“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式的麻木。

要有一声能够震醒深沉麻木的炸雷才好！

第一章 不等式

1988，北京大学度过了她的90华诞。

九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北大，这个“五·四”运动的发源地，这个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优秀学者、民族精华的最高学府，在她的诞辰之年，向十亿中国人又奉上新的光彩夺目的累累硕果——科研、学术上的五个第一，即：中国管理科学院首次利用科学计量指标发布学术榜，从全世界近4000种最有权威性的杂志上检索数据，北京大学名列中国（包括台湾）第一；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共179项，北京大学独得16项，在全国又为第一；国家教委颁布的1987年科学进步奖，北京大学获一等奖数和获奖总数第一；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，北京大学以8个特等奖、59个优秀奖的突出成就获第一；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评奖，北京大学又夺第一。

蚕吐丝。蜂酿蜜。

吃的是草，吐的是奶。

北大教师呕心沥血。

你要知道北大教师的辛劳吗？你只要看看北大深夜的灯光。晚上十一、二点钟到凌晨一点这段时间，你到校园宿舍区，到蔚秀园、畅春园、中关园、红四楼、黄庄等等地方，你看到哪扇窗户还亮着灯光，那必定是北大教师的住处，灯光下必定是熬得眼红的北大教师。这不是我夸张。我是老北大，我知道这是北大教师的传统。不信你敲门进去瞧瞧，准没错。至

于你要我讲讲北大教师的生活情况，我一个字就可以回答你：穷。这也不是夸张。本人兼北大教工工会工作，又是分管福利的，回答这问题有点权威性。据统计，北京市人均年工资为1343元，北大教师人均年工资却只有1227元，低于北京市116元，中、青年教师人均年工资更低，才800多元，和北京市差距更大。这部分人，教学、科研是超负荷的；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赡养扶育是超负荷的；经济支出是超负荷的。这么多超负荷，钢铁也要折裂，人能不垮？北大病的、死的大多是这些人。去年上半年调查，北大教师患病率达24.5%，而中年教师的患病率为26.9%；校医院登记的50名癌症患者中，教师就有23人，其中中年教师占17人。84、85两年北大死亡36人，教师占一大半，为22人；其中副教授、讲师又占死亡教师的大半，为17人。中国知识分子“价廉物美”，却不“经久耐用”。真是：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穷能致死。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是穷惯了的，好在他并不怕穷。所谓“安于清贫”，“安贫乐道”即是。长铗归来兮坐无车？可以。生就两条腿可以走路，可以蹬自行车，可以冲锋陷阵去挤轧大巴士；长铗归来兮食无鱼？可以。酱菜萝卜干，茄子白菜保平安，缺少点动物蛋白不在乎。可是，长铗归来兮居无宅，或者“宅如笼”（对不起，我把有些大学教师狭小的住房称之为“笼”，失敬之至，然而却很真实），就难以忍受了。知识分子怕就怕在这个“居无宅”或者“宅为笼”。自从有巢氏发明房屋以来，房屋便成了人类区别于兽的生存空间。人类的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和自身的繁衍，统统离不开这个生存的空间。大学教师，人也；而且人之师也，总不能“居无宅”吧？再说，不是“安贫乐道”吗？大学教师所“乐道”之“道”，当然是教学和科研。教学、科研起码得有个备课的地

方吧？得有个可以看书伏案的地方吧？要求极低，一张书桌的方寸之地而已。在如“笼”之宅里，又如何能“乐道”呢？可是北大，中国堂堂最高学府，至今还有不少教师处于“居无宅”或“宅如笼”的境地。我说的这个“不少”，不是几户，不是几十户，几百户，而是上千户。不信？有据为证。去年《北京日报》报道，北京人均居住面积达6.7平方米；而北大去年9月调查统计，北大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，远低于北京人均住房面积。现在北大有近600名青年教职工领了结婚登记证，却无房结婚；有近百名结了婚，仍然“居无宅”；其中不少人有了孩子，因无住房，孩子报不上户口，买不了油粮。有近800户拥有20多年教龄和工龄的副教授、讲师、职工，居住的是一间或一间半如“笼”的斗室。

已登记而未成婚礼的无房者，盼房盼得望穿秋水，这且不说。那些已结婚的无房者，少夫少妻，各守孤灯，鹊桥难渡，实在有点不人道。于是便出现了“周末鸳鸯度春风”之景。即：集体宿舍同室中，一人是已经结了婚的，另一为未婚者，一到周末，看在哥儿们情谊份上，未婚者回避一宿，让一对鸳鸯做上一次巫山好梦。如果同室中两位都是已婚的无房者呢？那更好，机会均等，此周末我让你，下周末你让我，谁也不欠谁的情。

户口，对每个中国人来说，有如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一般，实属性命交关。无房户生下孩子报不上户口，便不能购卖平价油粮。区区教师工资，哪能受得常年累月的黑市高价？没有户口孩子也上不了托儿所、幼儿园，进不了学校。于是，北大便又出现了“厕所户口”、“影子户口”、“口袋户口”等等奇事。其实，说奇也不奇。比如，校内某幢宿舍楼住户已满，无法再安户口。正巧大楼旁有一公共厕所，便把这厕所编

于门牌号，无房者把户口安在这门牌号上，人们便戏称这为“厕所户口”。也有干脆把户口报在那住户已满的大楼里，自己实际仍在集体宿舍，这户口便为“影子户口”；此类户口并无房屋的依托。房屋是虚构的，人是实在的，人即户口，所以又称其为“口袋户口”。这还是学校和派出所再三通融，行上天好生之德，给予教师的一个瞒上不瞒下的照顾。虽然如此，能报上上列户口者，占有孩子的无房户的比例也是微微。

至于那些已获得如“笼”斗室的副教授，讲师们，其境况比无房者也好不了多少。这些人一般年纪四十大几，五十左右。有一至两个孩子。孩子半大不大，都上学了，懂事了。挤挤轧轧安上一张小书桌，要和儿子女儿轮番用。夜里睡觉，床靠床（也有全家只睡一张床的），说句大白话，夫妻俩连做爱也无法做。一个大小子或者丫头睡在边上，你夫妻能做爱？有位副教授对我说，他很久不过性生活了。孩子懂事啦。躺在旁边，你知道他是睡是醒？有善谑者问孩子：

“夜里你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没有？”

孩子睁大眼，没明白。

“我问你夜里看到你爸你妈做什么了？”

孩子脸涨得血红，“呸”了一声逃了。

这玩笑开得虽说有点无聊，可旁听者心中凄然，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极度狭小的生存空间，把人性遏制、压抑、扭曲到何种地步！我真佩服我们中国人的忍受力。

北大，我们这个庄严而美丽的学府，神圣的科学殿堂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等式。北大教师人均收入低于北京市人均收入，是不等式；北大教师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，又是一个不等式；北大教师对国家、社会的巨大奉献与国

家、社会对北大教师的给予，更是一个不等式，教师付出的辛劳和为维持精力、体力所需而得到的补偿，仍然是不等式。你到我们北大一些教师家走走，你无论敲开哪一家门，你都会发现不等式的存在。

怎么样？试试如何？

三 人 床

床，有单人床，双人床，还没听过有三人床。

然而北大物理系讲师赵一广家睡的就是三人床。夫妻俩和13岁的女儿，一家三口就睡这一张三人床。

爱人也是物理系讲师。中国教师的工资虽低，两位讲师的收入总是可以再买一张小床的。可是，13平方米的空间，再也容纳不下小床的位置了。

书，书橱，箱子，衣橱，碗橱，小桌、盆、桶、罐、椅、木凳，宛如物质的原子排列一样，排得紧紧密密。如要取书橱里的书，先必须搬开挡住书橱门的半截橱；要搬半截橱，先必须搬开挨着半截橱的那张直径50公分的小圆桌，要搬开小圆桌，先必须移开木椅，而木椅上又有堆得金字塔似的书，于是先要搬书，才能移动木椅。真是，动一书而牵动全屋。那张三人床一面靠墙，三面都挤塞着东西，活像楔子一般塞在屋里，哪能再安小床？

三人床，正确的名称应为三人睡的床。因为它实际仍然是普通的双人床。女儿个子长得和妈妈差不多高，双人床如何能容三人？于是两位物理系讲师采用了原子重新排列、组合的方法：原来是顺着床的长度睡的，三人改为顺着床的宽度睡。但人体的长度超过了床的宽度，睡下来又双脚悬空，如何吃得

消？于是，便临时顺着床沿垫着一块狭木板。为了扩大空间，那木板在人起床后即撤。

“从女儿出生，到长大，现在进了初中，我们一家睡三人床，睡了13年了。看样子还得睡下去。”讲师苦笑说。

我进门时早已过了午饭时分，讲师和女儿还在小圆桌上吃饭。女孩儿长得白净精瘦，细长条型，貌颇如父，匆匆吃完，便上学去了。讲师也放下碗，奉茶待客。

小圆桌上仅有一碗吃剩下的煮大白菜。

讲师说，他爱人到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去了；她一做实验就是一整天还带个早晚。常常是两包方便面或者两只面包，便为她一日的饭餐。讲师说，家里饭菜也简单，什么方便，什么省时，就做什么饭菜，因为他的时间也极紧张。

“我是物理系85级级主任。每星期还要上四节大课。还有科研任务（我是研究半导体激光的，我在搞‘激光测距’的科研，这是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）。还有编讲义，写学术论文……我恨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工作才好。我把生活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。我没有星期天，我从不度假日。孩子埋怨我：‘爸，你就不能带我去一次颐和园？’我实在舍不得时间，只好狠狠心。想来，我对孩子十分内疚。但更叫我对不起孩子的，还是这张三人睡的床。

“孩子老问：爸、妈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什么时候让我单独睡张床？”

“我和她妈只得骗孩子：‘快了，快了。’口里这么说，心里难受得直打颤。

“不错，我们国家穷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可我去年到过锡兰，也就是斯里兰卡，亚洲著名的穷国，那里科伦坡大学的讲师，一家住一幢屋。今年我去意大利参加‘半导体激光与

集成光学’国际学术会议，访问过他们的大学，那里的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住的是花园洋房。意大利我们固然比不上，为什么连亚洲穷国斯里兰卡也比不上呢？

“其实，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造的新住宅也不少，北京就竖起许许多多的高层住宅大楼。可你看看里面住的，有几户是大学教师？很多还不是些有官职的住，或者是有官职的子女，甚至子女的子女住，大干部中有像我这样睡三人床的？

“我八十多岁的老岳母，不幸把腿摔断了，家里没人，想来女儿处有个照应。可我这里能来吗？只有这张三人床。

“去年我回老家河南探亲，我老母亲想跟我来北京玩玩。她说，儿子在北京当大学教授，做娘的连一次北京都没来过，岂不太亏？可来了怎么住，我只有这张三人床。

“两位老人最起码的愿望都没能实现，她们心里难受，我和我爱人心里能好受吗？

“在今年意大利的国际学术会上，我带去了两篇论文宣读，得到好评，后在一大学实验室做实验，那实验室主持人，一位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要我留在他那里工作，做他的助手，可我拒绝了。我回来了，回来睡我的三人床。

“人也怪，我害怕睡这三人床，可偏偏要回来，莫非我家和这三人床结下不解之缘？

“孩子仍在一天天地长大，我家三人床不知还要睡多少年月？真叫人寒颤。说实在话，我现在真想出去，想到邀请我的意大利去。”

至此，讲师叹了口气，像自语，又像问我：

“何时才能不睡这三人床？”

我默然，无言以对。

血染的风采与一元钱

他在讲坛上倒下去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时年48岁。

《北京日报》在一篇报道中赞叹：“在这讲坛上，也有那血染的风采。”指的就是他，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副系主任、副教授杨同立的猝然辞世。

这位为我国通信卫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中年科学家，这位曾获国际科工委科技二等奖以及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优秀学者，这位为学生们爱戴的老师之死，人们震惊而悲痛。

无线电系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以校长丁石孙为首的校领导都来了。追悼会的悼词对死者作了热烈的而又感人的赞颂：

杨同立同志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卓越的才能，朴实无华的作风，在困难的条件下，取得多项优秀成果……

杨同立同志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；在国际学术活动中，为我国取得了荣誉。他的全部心血，都洒在我国科技、教育事业之中……

这简直是一篇英雄的颂歌。

副教授遗下了在另一大学作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年仅13岁的未成年的女儿。

追悼会开过，丧事办完。对这位“全部心血都洒在我国科技、教育事业之中”的死者的遗属——未成年的女儿，按规定需发遗属生活补助费，以使遗孤的生活得以保证，健康地成长。这也是对九泉之下的人一个慰安。

每月补助多少钱呢？经有关部门议定，竟是一元人民币。

决定传来，死者家属，初则悲愤，继而木然；死者同事，初则惊愕，继而哗然。从助教、讲师到副教授、教授，莫不心寒。

中国知识分子固然“价廉物美”，也不致“价廉”到如此地步！

一元人民币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，其市场的实际价值为：
仅够在王府井小摊上买一串冰糖葫芦；
或在小食品店购两只面包；
或在早点铺里买5只油饼；
或在糖果店里买十块夹心水果糖；
或在叫卖冰棍的小推车上买两块花脸雪糕；
或买一串现烤现卖的羊肉串……

13岁，正是孩子的生长发育时期。身为“遗属”，亦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。吃、穿、住、用，读书上学，无一可缺，难道拿这一元人民币去作“画饼充饥”用么？

我见到了副教授的妻子。

副教授去世两年了，家里特别清冷。她是讲师，刚刚下班回家，未来得及生炉子，更觉寒丝丝的。女儿15岁，个子一个劲儿地拔高，可白苍苍的脸色，显得羸弱。却很懂事。她和客人说话，女儿默默地热情地给客人递茶送水。

“同立是活活累死的。他像一部不停飞转的机器，一直超重负荷地运转。

“他是分管全系科研的副系主任，还上大课，还带研究生，还为国家科工委搞科研项目，参加通讯卫星的研制工作。他没有休息日，寒假暑假没有他的份，他太忙。他父母在天津，天津离北京两小时路程，他就是没时间回去。在他去世前那个暑假，他终于去天津探家了。原想多呆几天，可才呆一天，便又回北京了。学校科研经费下来，系里要他研究安排。接着便出差，去湖南开科技会议。到那里就病了。从湖南回来，到家是夜里11点钟。第二天一早又赶赴山西太原。那里有国防科工

委项目，某通讯兵部队的仪器设备等待他调试哩。他就在那露天院子里，站着干了一天一夜。从山西回来就上课。上完四节大课，又去沙河开鉴定会。从沙河回来，感到脸发麻，特别想睡觉。可还是每天上班，在系里忙。

“我要他看病，他说没时间。他从来都是这样：要他今天去医院，他推明天；到了明天，又推后天；到了后天，又推再后天，总是没空，最后还是不去。他舍不得时间。这次我可发急了，不去不行，他才同意让我给他挂号。我在西苑中医研究所给他挂的专家门诊，挂号费两元，他后来知道了，埋怨我不该花这么贵的挂号费。

“他十点钟下的课，匆匆赶到医院，两手粉笔灰，拎着个破提包，让大夫看病。大夫要他休息，他自以为是受了风寒，说没关系，照样上班、上课。万没想到，那天在课堂上倒下，就再也没能起来。”

“我和女儿怎么也想不到他从此与世长辞。他走得那么猝然。病危之际，他向探望他的同事嘱咐了系里的工作，却来不及留下对亲人的嘱咐，便离开了我，离开了刚刚给他喂饭后匆匆上学去的他最心爱的女儿，离开了人间。

“同立是活活累死的，他给国家、给人民作出了贡献。他没有虚度年华。与地球同步的通讯卫星上有他辛劳的汗水，他的智慧、才能、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。可是这一切，在中国有些人眼里，又值几何呢？除了追悼会的悼词外，几乎不值一钱。

“我实在想不到，他们给同立的遗属生活补助费每月竟只有一元人民币。开始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。后来他们解释了给一元钱的根据。原来我当时的工资为78元。按北京市最低生活标准计：大人生活费为50元，孩子生活费为29元。就是说，

按最低生活标准，我和女儿生活费每月79元就行了。而我的工资收入已达78元，差额只少一元。所以只发遗属生活补助费一元。

“他们就是这个逻辑。还有更叫人气愤的。他们后来再算算，我们娘儿俩，还有5元猪肉补贴收入未计算进去。这5元加上我工资78元，就是83元，还超过两人的最低生活标准4元呢。既然超过，后来连这一元钱也不补了（所以我说，同立的死在一些人眼里不值一钱）。

“据说，这是制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样的制度？这是哪一家的制度？

“我悲伤、气愤极了。北大无线电系的老师们也都心寒透了，忿忿不平。

“眼看要激起众怒。也亏这些执行制度的人，想出了一个通融办法。同立有老人，学校给老人每月增加生活补助费12元5角，这12元5角就转发给孩子。这样，我们这孩子——死者的遗属，每月才得到这可怜的12元5角。这还是假冒顶替得来的。

“制度，我要问问这制度，为什么为国为民活活累死的知识分子，他的妻子、女儿非要按照最贫困的水平线生活？”

已故副教授的夫人含泪激愤地问。

我看到那个女孩，那懂事的文雅的可爱的女孩，默默地站在一边，睁着一双忧郁的大眼，仿佛在寻找答案。

我不由感到一阵寒颤。

我不知怎么离开那座冷冷凄凄的屋子的。回到住处，我耳里还在响着已故副教授的夫人的带着激愤的呼问，脑里仍浮现着那女孩的一双忧郁的大眼。

我在想：如果杨同立不是副教授，而是带“长”字号的官